

·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清史研究 ·

## 明清易代后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

赫 治 清

17世纪中叶风云际会的中国历史舞台上，明、清、明末农民起义军三大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角逐，清朝成为最后赢家。这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改朝换代。由于清初统治者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，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于汉人，按照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生活方式行使统治，推行诸如圈地、缉拿“逃人”等暴政，用农奴制取代地主制和租佃制，不惜用武力高压手段强迫汉人“薙发”“易服”，改变汉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，制造“扬州十日”“嘉定三屠”等惨剧，因而满汉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。当时，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士人看来，明清鼎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及“治统”更迭，而是关系中华文明兴废、民族存亡的深重社会危机。于是，一股强大的保卫民族生存权利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情，便在各阶层群众中汹涌奔腾起来。特别是一些汉族士大夫基于“华夷”观念，痛感“以夷变夏”，对清政权不但不认同，反而高举“反清复明”的大旗与之殊死抗争，明清易代长达数十年之久，过程错综复杂，斗争极其惨烈。

虽然清朝用武力获得了中国“治统”，但并不意味着正统地位的奠定。清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奴役、压迫政策，给汉族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心理造成的伤害，满汉隔阂和鸿沟，依然严重存在。如何弥合伤痕，缓和满汉矛盾，化解“以夷变夏”的误解，安定人心，重建业已残破的社会秩序，让广大民众尤其是士人认同清朝，以求政权巩固，国家长治久安，这是摆在清统治者面前的严峻挑战。

本来，早在入关前，后金（清）就开始学习吸收中原文化。定鼎北京之初，也采取开科取士、祭孔、祭祀中国历代帝王等措施。顺治帝亲政后，“临雍释奠”，公开表达对孔孟之道的崇奉。顺治十年（1653）正月，顺治帝与臣僚谈及汉唐以来何帝为优时，强调“历代贤君莫如洪武”，并称“洪武所定条例章程，规画周详，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”<sup>①</sup>。十二年（1655），明确提出“帝王敷治，文教是先”，“今天下渐定，朕将兴文教、崇经术、以开太平”<sup>②</sup>。他还多次谕令停止圈地、限制带地投充。诚如孟森先生言，“世祖开国之制度，

<sup>①</sup>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七一，顺治十年正月丙申，北京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，第567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九〇，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，第712页。

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，余皆沿袭明制”<sup>①</sup>。然而，“清承明制”，却遭到满洲上层贵族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和反对。顺治帝一去世，他们就明目张胆打出“率循祖制，咸复旧章”<sup>②</sup>的旗号，大开历史倒车，直到康熙帝亲政并清除鳌拜集团之后，才扭转了这种局面。

康熙帝自幼熟读经书，在理学名臣推动下，积极吸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，亲政之后断然清除辅政大臣鳌拜等守旧势力，拨乱反正。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（1677年12月31日），他在《日讲四书解义序》中明确宣布，将理学作为定国安邦的指导思想，将所谓“唐、虞三代文明之盛世”<sup>③</sup>作为清朝社会的发展方向，把儒家道统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。俨然以儒学道统的当然继承者自任，并将道统与治统合一，强调以儒家的四书五经来治理国家，统驭万民，将正统儒学，特别是程朱理学确立为清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，提出“敬天法祖、勤政爱民”的政纲，制定了“崇儒重道”的基本国策。

与此同时，顺治帝、康熙帝及其后继者，在礼乐制度上也继承了代代相传的中华文明。通过在京建造历代帝王庙，多次对其入祀和配飨名臣进行调整和增补，最终建构出包括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代帝王一脉相承、绵延不绝的完整统绪，以此显示对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的归属。

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、国家认同的基础。康熙帝在其父的基础上，强调“满汉一家”“华夷一家”。后继者雍正帝、乾隆帝，积极作为，通过“辩华夷”“论正统”，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国家认同、中华民族认同、中华文化认同，破除儒家原来狭隘的“华夷”观，构建了新的大一统观念，并付诸实践，从而在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上作出了超过前代的卓越贡献，最终奠定了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版图。

清朝开国以来，尽管治国理政有过短暂的曲折反复，但终究没有沿着满洲传统政治方向发展，反而基本上沿袭了明朝发展成熟的封建集权政治体制和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方面制度，一方面推动自身最终完成向中原政治文化转型，另一方面也发展了汉唐宋明以来传统的大国治理模式。正因为如此，清代前中期出现了持续百年的“康乾盛世”，展现了封建时代的最后辉煌。清代前中期的中国道路，实际上是带有满洲文化特色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复兴之路。

所谓清代明而兴，斩断了中国历史进程，是历史大倒退。这类说词是值得商榷的。

（作者赫治清，1939年生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
收稿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

---

① 孟森《明清史讲义》下册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397页。  
② 《清圣祖实录（一）》卷三，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，第712页。  
③ 《康熙起居注》，第1册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339—340页。